

中国外语教育史

A Histor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付 克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国外语教育史

A Histor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付 克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语教育史 / 付克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2004重印)

ISBN 7-81009-065-8

I. 中… II. 付… III. 外语教学—教育史—中国

IV. H0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2321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王冬梅

印 刷: 上海江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8 插页 字数 277 千字

版 次: 1986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4 年 3 月 第 3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09-065-8 / H · 039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1.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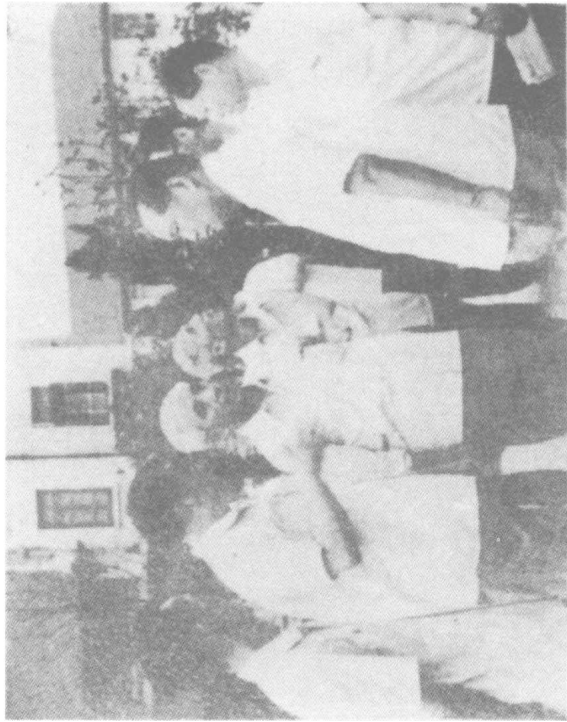
2. 1960年9月，陈毅副总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向师生作报告。



3. 1950年初，上海市市长陈毅主持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校务会。舒同（左三）、姜椿芳（左一）等同志在座。



4. 陈毅市长在上海俄专校园内接见部分外侨教师。



5. 左上：廖承志同志给北京外国语学院师生作报告(1978年)。

6. 上：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视察上海外国语学院(1984年)。

7. 左下：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在上海参加俄语教育座谈会(198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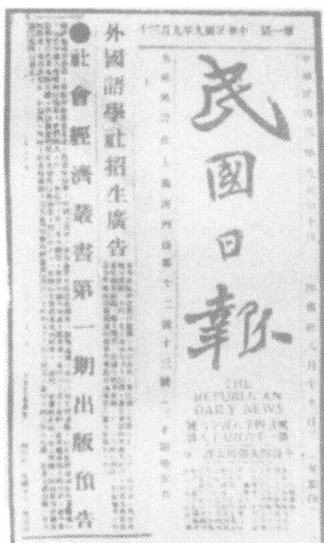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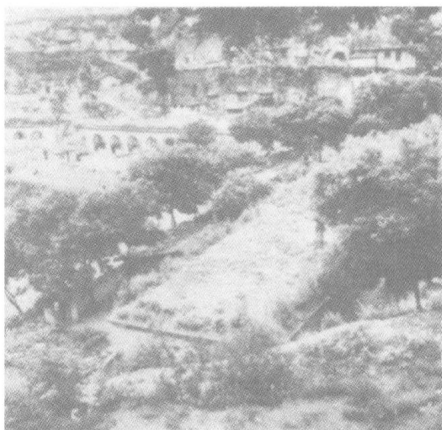
8.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外国语学院，旁边为院长张锡铸（1957年）。



9. 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左一)视察上海外国语学院，旁坐者为院长胡孟浩教授（1984年）。



10. 我党办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1920年)。



11. 1943 年延安外国语学校旧址(延安和尚塔)。



12. 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系部分毕业生赴华北地区工作(1945 年，张家口)。

13. 外国语学校师生乘车前去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北京)。



14.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第二十班毕业留影，中坐者为学校领导人师哲、张锡侑(1953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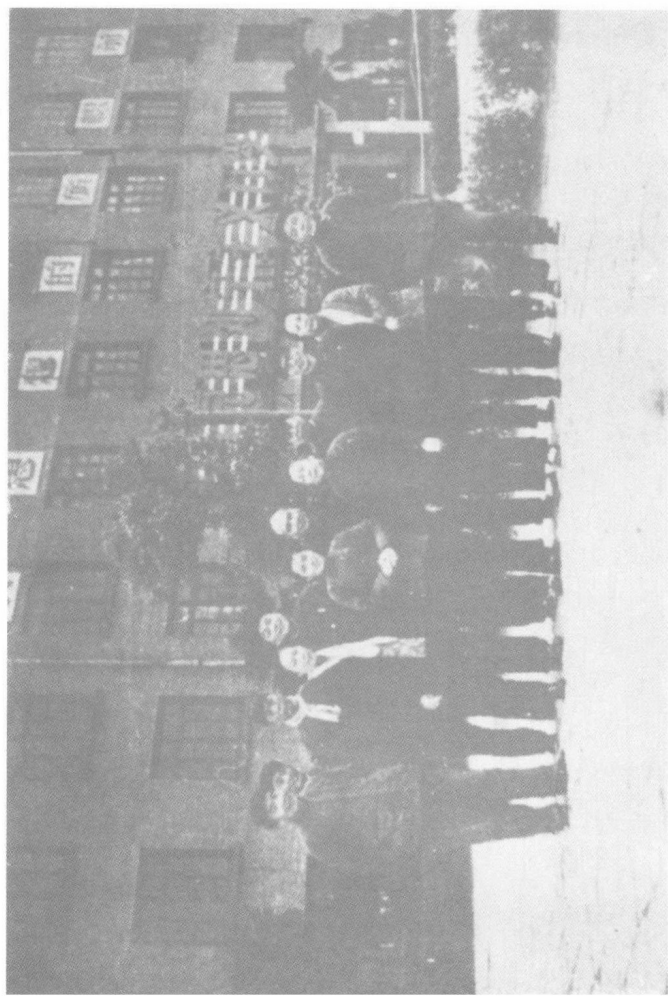




15. 王季愚(右三)、赵洵(左三)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部分学生合影
(1958年，哈尔滨)。



16. 哈尔滨外语专门学校白楼旧址。



17. 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季愚(右五)与院党委成员合影(1964年)。



18. 苏联外语教育代表团访问上海外国语学院(1984年)。



19. 1984年，延安外国语学校部分在京毕业生和当时校领导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影。中坐者为学校创始人校长曾涌泉和俄文系主任卢竞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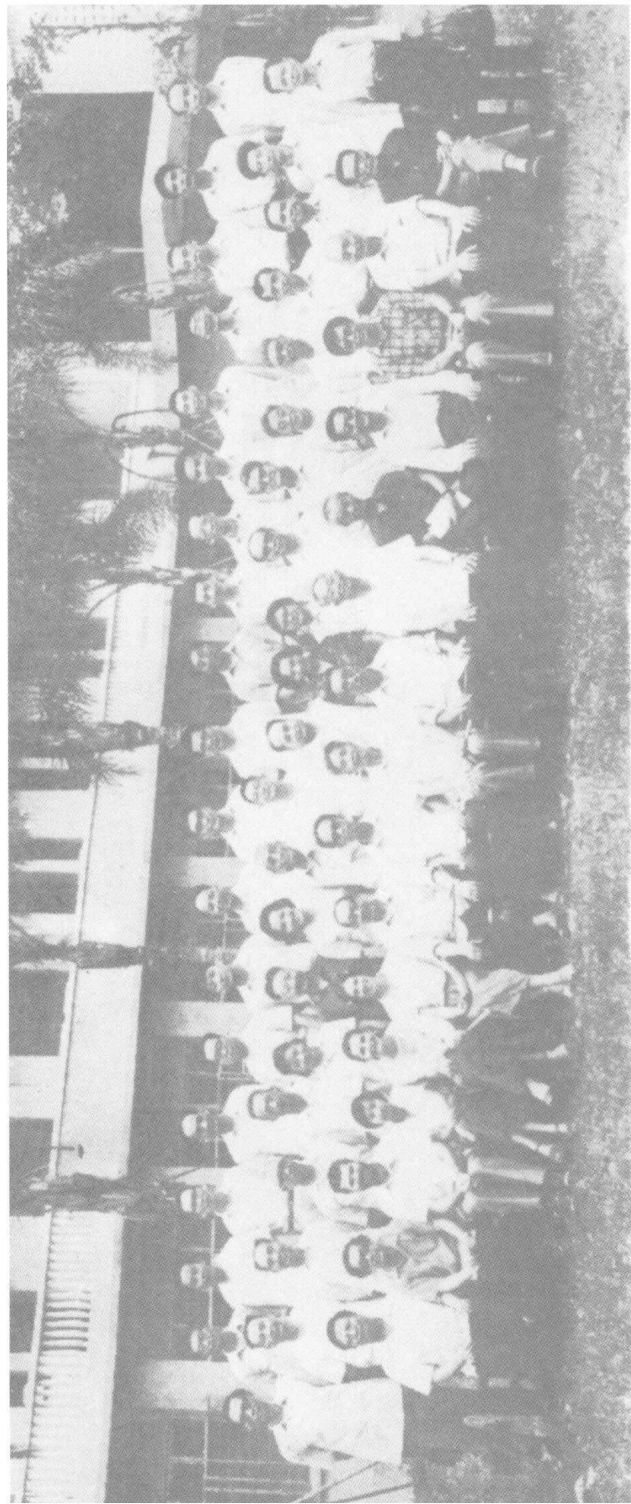
20. 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1982年，武汉)。



21. 1982年，俄罗斯、苏联文学史教材审稿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中为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左四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羨林教授。



22.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1981年5月在上海成立。俄语教育界前辈师哲(前右六)、赵洵(前右七)、付克(前右五)等应邀出席。



23. 第一届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讨论会1980年6月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前排右起：王宗炎、李赋宁、张日昇(香港中文大学)、黄宏熙、王多恩、许国璋、戴镛龄、谢文炳、付克、陈嘉、缪锦安(香港大学，左一)、郑艾伦(香港大学，左四)、余晃英(香港理工学院，左二)。



24. 建国后第一次外国文学翻译评奖，由江苏《译林》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两家编辑部合办。图为评奖委员会合影。前排坐者左起：冯亦代、毕朔望、付克、陈冰夷、戈宝权、方重、叶之臻、戴乃迭、叶君健、卞之琳、杨周翰、胡孟浩、高斯、李芒、陈胜进。

前 言

接触外语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三十年代初,从小学到中学,学过几年英语,但收效很少,又长期不用,慢慢遗忘了。

四十年代初又开始学习一种更为陌生的俄语。这次由于结合工作,对外语的用处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学得不好,但比学英语效果就好多了。学习结业后,从事了一段翻译和教学工作,时间虽不长,但对学好一种外语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五十年代初,我从学校调到教育部工作,时值全国掀起学习俄语热潮。不久成立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归教育部领导,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这段时间广为接触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和教学工作,较为系统地了解了外语教学各个方面的问题,从师资、教材、教学方法直到外语教育方针政策的制订都有所接触。

一九五一年,我代表教育部在成都接办美国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并留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分文、理、医、药几个学院。整个学校是个英语环境。各院系的课程多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师、学生、职工的外语水平较好。这样就有机会了解这所学校的教学特点和外语教学情况。这所学校的教师不少是英、美、加拿大人和归国留学生,可以直接用英语讲授各种课程,学生多数均达到用英语听课的程度。因为学生入学时英语已有一定的基础,适应这种环境并不太吃力。可见,在中学阶段把外语基础打好是关键。听、说的基本训练应在中学阶段解决,对这个问题逐步加深了认识。

六十年代批判了外语(主要是英语)教育中的单纯文学体系和